

**
*
*
*
**

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
*
*
*
*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战线的提出	1
二、孙中山重建帅府与国共合作的初期	5
三、国民党改组的前后	7
四、黄埔建军	15
五、党军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22
(一) 商团叛变事件	
(二) 第一次东征	
(三) 讨伐杨刘	
(四) 廖仲恺被刺前后	
(五) 第二次东征	
六、3月20日事变的前后	47
七、北伐时期	58
八、蒋介石独揽军权篡夺党权的形形色色	59
九、北伐军光复武汉的前后	62
(一) 醴陵战役	
(二) 平江战役	
(三) 岳州战役	
(四) 汀泗桥战役	
十、战时的武汉	82
十一、武汉行营时期的二、三事	90
十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前后	103

十三、蒋介石叛变以后..... 1 1 1

(一) 夏斗寅叛变

(二) 长沙马日事变

(三) 邓演达出走

十四、革命武装斗争的新阶段的开始..... 1 1 9

编者按：本文作者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现在写出亲身的经历如黄埔军校中革命与反革命斗争，蒋介石的种种阴谋，以及夏斗寅叛变等，都记述了许多具体的情况，可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参考。作者所记主要是亲身的经历，当然不可能写出每件事情的全部过程，还望参与其事的先辈们，把自己的经历都写出来，以为补充考证。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战线的提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氏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只开了五天，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出席做报告，谈的是第三国际的使命，国际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第四天的会议马林到会，是准备谈当时民主运动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刚一开会，法国巡捕房有一个侦探闯入我们的会场，我们发现了马上散会。第五天的会我们是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的，马林不便参加，所以马林的这个意见一直到会后一个多月才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书记是陈独秀，他此时还在广州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马林的意见是：（一）、陈独秀要到上海履行他的职务。（二）重新部署党的工作。（三）建立民主运动的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又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陈独秀回上海同马林会商了好几次，最后决定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中国劳动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最后是由马林出面同孙中山先生商谈的。

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他内受粤军将领陈炯明、叶举等的挟

持，外受北洋军阀的围攻。为了免除内部的冲突，希望向外发展，他亲率建国第一军黄大伟部联合一部分桂军刘震寰等出驻桂林，名义上是北伐，实际上是缓和或者说是避免与陈炯明的冲突，也只求陈炯明按月给他相当的给养，至于广东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一切用人行政，他都不过问，陈炯明一身兼九个要职，如军政部长，内政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之类，可以说广东政府实际权力是在陈炯明的掌握中，已形成了陈炯明的“狄克推多”的局面。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北伐军大元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而且陈炯明已与北洋政府信使往还，孙中山有随时被陈炯明攻击的危险。

马林此次到广州访孙中山，为了避免经过香港（马林曾在香港被驱逐出境，如再经过香港即有被捕的危险），所以他从上海坐怡和公司的船到武汉。我事先接到党中央的电报，按时到怡和码头接他，他偕同张太雷同志带着很简单的行李，下了船即叫一个小划子过江，到徐家棚粤汉铁路火车站上火车去广州。

马林到达广州，廖仲恺在广州招待他，很快地就派人送他到桂林。孙中山先生和马林做过好几次的长谈。主要的是谈中国革命问题，也涉及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建立“联俄”、“联共”的关系，在国际方面得到苏俄支持，在国内得到共产党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使他广东摇摇欲坠的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力量。

孙中山和马林会谈之后，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由桂林回到广州，下令免去陈炯明的本兼各职。虽然陈炯明叛变了，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孙中山先生被迫离开广州，但在革命的真理与正义的支持下，不到几个月的光景，陈炯明也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加以滇军杨希闵、范石生和桂军刘震寰等东下，豫军樊钟秀南下，在广州近郊一战，

陈炯明溃败，孙中山仍回广州，重整旗鼓，再来主持革命大计。在这个时期陈独秀一度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的宣传工作，这在当时对于收拾人心，振作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约在1920年粤军回粤之后，孙中山先生当选非常大总统之前，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时，曾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从事实判断陈炯明对陈独秀似有相当的信任。陈独秀离开广州时是1921年9月的前后，孙中山下令免陈炯明本兼各职是在1922年6月中，此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在酝酿中，并无成议。陈炯明被孙中山免职以后，即由广州退到惠州，表面上通电下野，暗中是在进行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权，实行他的所谓联省自治。在这双方相持的形势之下，国民党人跟着孙中山的固然是多数，跟着陈炯明走的也有，首鼠两端乘机观变的也有，而共产党在当时政论上是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在陈炯明叛变，叶举炮击总统府的前后，广东的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谭鸣讦（谭平山的原名）等违反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陈炯明搞在一起，党中央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党籍，谭平山也受了处分，要他到北京听候分配工作。1922年秋天“今日派”的领袖胡鄂公希望加入共产党，多方拉拢共产党人，他拉谭平山到高等警官学校任训导主任。当时李世璋是胡鄂公的党徒也在警官学校任职，李世璋同谭平山的关系就从此开始。一直到1923年秋冬之交，孙中山再回广州主持革命大计，正式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共产党才派谭平山回到广东参加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陈公博、谭植棠一直追陈炯明到底，陈公博骗了陈炯明一笔钱，溜到美国混了两年。到1924年他又以邹鲁的关系回到广州，初在广东大学任教，曾向共产党要求恢复党籍，遭到拒绝。未几陈公博接

近廖仲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廖仲恺被刺的前后他又作了广东省政府的农工厅长及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他由汪精卫又搭上了蒋介石，他成了蒋汪之间的红人。在3月20日事变中，他完全投到蒋介石门下，1926年国民党政府出师北伐时，他在广州发表祝词希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凯末尔，以后即明目张胆地站在反共的旗帜之下，死心踏地做革命的敌人，一直到中日战争爆发时当了汉奸。在他当汉奸的行政院长时，写了一本什么《寒风集》，为他自己涂脂抹粉说，他在共产党初期如何重要，1922年孙陈战争中他如何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并凭空造谣说在孙陈战争前陈独秀曾拉他一路到惠州去访陈炯明。他主要的用意是想把当时的历史事实歪曲，诬蔑共产党。这一些汉奸的胡说八道，我们必须把它揭穿。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到1923年底正式建立起来，在联合战线的初期，发生了不少的波折，主要情况是在国民党方面有一股反动的逆流。在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先生理解到国民党的失败，仍然是因为组织不健全，纪律不严密。更以受了列宁的启示，苏俄革命的影响，所以马林的建议一提出，他就很敏感地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在决定改组国民党时，谢持、居正、田桐、张继、冯自由等极力阻拦；孙中山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不能勉强拉我不革命。他们鉴于孙中山态度坚决，无法挽回，他们不跟孙中山走，也没有另外搞一套的政治本钱，因此就造成了国民党内的反共暗潮。从表面看，当时国民党内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活动的有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等等，但是事实证明真正襄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只有廖仲恺等少数

人而已。如伍朝枢、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等大小军政学方面的人物，多半是乘机观变，依违两可，或是别有用心。如胡汉民等一面装出孙中山的股肱、心腹的样子，参加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暗通右派搞反共反俄的活动，这就是国共联合战线建立初期国民党方面的情况。

共产党方面，对于这一次国共联合战线，虽然也有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经过了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对于合作的方式也有过争论，最后的决定是：共产党员得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内部可以指定某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党中央书记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参加国民党工作。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毛泽东同志、李大钊同志、林伯渠同志及谭平山、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事实是孙中山指派的），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这样才把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与政策方针作了新的部署，中国国民党的阵容为之一新。

二、孙中山重建帅府与国共合作的初期

1923年秋冬之交，滇桂联军东下，湘军各军南下与粤军陈炯明所部各军会战于广州近郊，陈炯明虽然败走东江，所部叶举、林虎、洪兆麟、谢文炳、陈修爵等尚有二三万人，他们割据在东江富庶之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他们的最前线布置到石龙，对广州的威胁很大。入驻广州的部队如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赵成梁等原仅破烂不全的六个团，进驻广州以后，以补充整顿也不过一万多兵员，桂系刘震寰部不过三四千人，湘军樊钟秀不过二千多人，湘军谭延闿、陈嘉佑部驻粤北不及万人，还是官军的地位。以军事实力而论，陈炯明还是占优势。更加以潜伏在广州市郊的民团和界乎

兵匪之间的李福林、魏邦平、朱单文、袁虾九等以乡土关系与陈炯明也暗通声气，这对滇、桂、湘、予各军也是很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不得不打起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派代表打电报请孙中山先生回粵，主持革命大计，但是在骨子裏面他们都是进行割根之实。孙中山先生准备回广州之前，电令邹鲁筹款二十万元作为大元帅犒赏各军之用。因邹鲁历任广州财政厅长，望运使，他很有钱，但是邹鲁装病逃到香港避不见面。孙中山到了香港，回不了广州，才由孙科出面找吴铁城（吴铁城曾做过香山县县长，刮了不少的地皮）拿出八万元，孙科又找了他的喽囉凑了两万元，共凑了十万元，才能回到广州，组织大元帅府于河南士敏土厂。孙科、吴铁城因这一次筹款有功，遂形成所谓太子派的小组织，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并立，后来都发展为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反共恶劣势力。孙中山先生回广州以后，即发表孙科为广州市政厅长，孙科力保吴铁城为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其瑗为财政局长。形成了太子派的阵容。

孙中山回广州为什么选择士敏土厂做大元帅府呢？因为广州市内精华之区，都被滇桂军占据完了，他们占据广州以后，和陈炯明占据广州一样，赌场、鸦片烟馆、娼寮，星罗棋布，军人横行，盗匪充斥，杀人越货，时有所闻，孙中山先生亦莫可如何。

广州市的赌税，鸦片烟税、花捐收入很大，均入了杨希闾、范石生、廖行超及桂军刘震寰的私囊，江北为赵成梁的割据，还有就食广东的湘军谭延闿、陈嘉佑及杂牌军队何成濬的鄂军，李明扬的赣军，朱培德的建国滇军各部。西江为粤军许崇智所部占据。河南为李福林所占据，各私其土，各有其民，大本营的开支，是十分艰窘。所以大本营的编制很小，胡汉民任秘书长，徒具虚名。黄昌谷任秘书兼金柜司长，此外只有一些挂名没有事做的参军、参谋、秘

书、付官及五十多名的卫士队。他们的卫士多半是华侨子弟，卫士队长卢振柳也是一个华侨。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与陈炯明占据广州时还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思想和作风改变了；他放弃了军事投机的革命方法，他不重视那些落在时代后面的军人，他决心学习苏俄、联合共产党，发展群众，依靠工农。联俄、联共、工农政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马林与孙中山多次的协商，最后由孙中山、马林、中共中央共同决定的。

三、国民党改组的前后

中国国民党改组是孙中山先生决定的，在国民党内一开始就遭受很多人的反对，经过了孙中山先生对他们的说服教育，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分化形成三类：第一类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代表人物是居正、田桐、谢持、单振、冯自由等，在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开始，他们离开广州，表示反抗，他们宁可投降到北洋军阀的门下，奔走于卢永祥、孙传芳、齐燮元、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那里当走狗，也不参加国共合作的局面。这一类的人物后来发展形成最反动的集团——西山会议派。第二类是国民党的中间派，他们同意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反对联共，他们以为联俄可以得到国际上的声援，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帮助，所以同意联俄。其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在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之内，久已感到粥少僧多，他们把共产党理解为同他们一样，他们怕船多碍港，不便私图，所以不主张联共。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张继、邹鲁、戴季陶、徐苏中、邵元冲等，他们在表面上是服从孙中山，而暗中是与第一类的人物通声气，并在广州、上海以及全国各地散布反共的空气，鼓动反共的风潮，后来他们也成为西山会议派，至1927年蒋介石叛卖革命，他们起了很大的翻云复雨的作用。第三类是当时孙中山的亲信干部，

参与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谋议，他们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后来发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但在当时他们对国民党的改组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表示拥护的。这一类的人物主要是：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蒋介石等。此外还有同情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不参加实际活动保持缄默的态度的如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等。还有不问孙中山搞什么，只要有搞头，总跟着孙中山走，如李福林、邓泽如、陈树人、古应芬、伍朝枢等。孙中山对改组国民党，实行新政纲，贯彻三大政策，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国民党无组织、无纪律。今后我们一定要学习苏俄，发生在中国革命之后，而成功在中国革命之前，就是因为苏俄有列宁领导的党布尔什维克，它有健全的组织与铁的纪律。今后我们一定要学习苏俄，着重党的组织工作与遵守党的纪律，这是党的最高原则。任何国民党员，如果不重视这个原则或违反这个原则，一定要受严厉的处分。接着冯自由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联俄、联共。孙中山即明令开除冯的党籍。其次柏烈武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曾表示反对宣誓打手印等规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态度模糊，孙中山在大会中提出要柏烈武表明态度，并责令他在大会上表示悔过。柏烈武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在大会上做了检讨，表示悔过，这就是孙中山建立党纪的开始。自此以后有一个时间党内公开反对联俄联共的活动是没有，而反共的暗潮仍在发展中。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是多种多样的，当时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并没有地方组织，就是在广州的组织形式也不完备。因此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有的是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的是几个老国民党员联合提出，经孙中山批准的，有的是共产党提出，

孙中山同意批准的。在全国各地国民党没有地方组织，共产党有地方组织，那就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之下由共产党提出人选由中共中央核准取得孙中山或国民党的同意来决定，如武汉的代表是刘伯垂、廖乾五、李隆至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产生出来的，例如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是由当地的国共双方的负责同志协商产生出来的。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都经过了孙中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决定，虽然说孙中山和他的亲信干部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也有他们的意见，而主要的内容，反帝、反封建军阀、联俄、联共、工农政策等都是共产党方面提出，孙中山同意决定出来的。

在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即在广州市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于华侨路惠州会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秘书处，这个机构就当时的情况说很庞大，共辖会计、庶务、文书、机要各处室，工作人员不下数十人，秘书长是廖仲恺，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后改为书记长）秘书干事各若干人。另外设组织、宣传、农民、海外四部：组织部长是谭平山，秘书杨乾安，这一部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组织部内有一个职工运动的组织，是阮啸仙、刘尔嵩在那里负责。宣传部长是戴季陶，付部长是邵元冲，秘书是郎醒石、刘芦隐、甘乃光等。宣传部内设了一个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的主任是徐苏中，宣传部内差不多都是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他们天天在那里制造谣言，发动国共两党的磨擦。农民部的部长是廖仲恺兼，另外有一个代理部长是个老国民党员彭素民，他是江西人，在1924年夏秋之间脑冲血死了。林伯渠同志曾兼农民部的付部长，因为他到武汉主持两湖的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他并没有到农民部。在1924年国共两党所计划的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展起来，

只有彭湃同志在广东东江开始搞农民运动，农民部的工作不多，工作人员也很少。海外部是邓泽如、陈树人任正副部长，这一部的工作不多，人员也很少。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属于总理，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国民党的总理载在国民党的党章，国民党当时虽然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各部各处，都是秉承孙中山的意旨办事，从形式上看这个总理制度好象是个人独裁，从实质上说，这个总理制度就是国共合作的保障，否则那些右派分子随时随地地可以起哄，制造国共联合战线的破坏活动。

1924年初夏，我在武汉工作，我们党的机关部在汉口模范区德润里23号，被军警机关查抄，许白昊、刘伯垂两位同志被捕，我同项英、廖乾五同志都在吴佩孚、肖耀南的明令通缉中。党中央调我到广州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约在五月中旬，我在上海同谭平山、周佛海结伴到广州。谭平山同我一路到宣传部见戴季陶，先谈了一些我在汉口被迫害的情形，其次谈了一些宣传部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同戴季陶见面，他穿一套黑烤纱的短裤褂，留着两撇小胡子，态度轻佻，言语诙谐，活象一个小商人的样子。他当面答应要我担任党员干部训练班的训育工作，我只好答应，他便送我出来。当天下午我就去找谭平山，我问：“党员干部训练班应该是属于组织部的工作，怎么由宣传部办呢？这个班在什么地方呢？”谭平山说“最初是为了开展组织工作，想招收各机关、学校、社团、部队的青年党员加以训练再回去担任各单位的小组长或区分部区党部的组织工作，我们定出方案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时，戴季陶要由宣传部办，廖仲恺等都赞成戴季陶的意见，我也不便力争，就只好让他去办。至于怎么办？在甚么地方办？我也不知道。”这就说明国共联合战线一开始，国民党人对于共产党人就是采取防御

态度，没有分工合作的精神。他们宁可少办事，或者不办事，不能让共产党有机会活动发展。而共产党方面，遇事采取退让态度，强调合作的重要，忽视斗争的必要，所以谭平山的组织部长和他所领导的组织部在国民党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到了第二天再去找戴季陶接洽训练班如何开始工作的问题，他介绍我同邵元冲、郎醒石见面，并说关于党员训练班的问题你们商量一下，他就走开了。邵元冲、郎醒石对我很冷淡，我真不知道同他们说什么才好，我坐了半个多钟头的冷板凳，他俩个拿着报纸看，也不理我。我不耐烦了，我即以沉重而急遽的声调问：“你们俩位有什么话说没有？”我便站起来准备要走，邵元冲抬起头来好象是看见了我的脸色，低下头去说：“今天我还没有准备，明天再谈吧！”我便紧接着问：“明天谈吗？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谈些什么问题？也请你先告诉我，我也要作个准备。”他慢吞吞地说：“明天上午九点钟，地点仍在宣传部，谈的问题明天再说，你也用不着作什么准备”。我便出了中央党部，跑回旅馆，当时我带着我爱人夏松云和孩子住在永汉马路珠江旅馆，周佛海也住在这里等着派工作。我便把我在中央党部的一切情形告诉了他们，最后我说：“我想回上海。夏松云劝我忍耐着看，周佛海同我的处境相同，也很气忿，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去找谭平山汇报一下情况，好决定去留。我们气冲冲跑到谭平山家里，一口气把我在中央党部接洽的情况告诉他，我并说：“我不愿同这样的臭官僚共事，我要回上海”。谭说：“不要急，慢慢来，你既然同他们约好明天去谈，还是要去，他们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所以冷你，在工作中他们知道你的厉害了，就怕你了。”他哈哈大笑一阵又接着说：“今天晚上中央党部在广东大学有一个集会，欢迎各地被压迫来广东的同志，请了你，一定要到，并要讲话。”我

本来抱着一腔怨气而来，被谭平山同我嘻皮笑脸地闹了一阵而冲淡了。我们临走时，他给我同周佛海备30元毫洋，作为开销旅馆的费用，他并关照我说，“这是中央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胜利地完成，不要打败仗。”我们才分手。到了第二天上午九时，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邵元冲对我说：“戴先生到香港去了，何时回来不知道，训练班的工作，以前我没有参加，戴先生也没有明白交给我怎么办，所以昨天我不知道如何同你谈。昨天下午同廖先生（仲恺）会议后决定：仍按组织部拟定的计划调训，从下星期一起，学员开始报到，定期两个月毕业，每天上课两小时至四小时，间天开一次讨论会，你同我们一起指导讨论会的工作，其余的事另外有人办，你可以不管。训练班的地点就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办公地点就在宣传部，讲课的都是党政各方面的负责人，由宣传部约请。”他说到这里心不在焉地上楼去了。我退了出来，非常纳闷。

过了几天，训练班开学了，没有主讲的人，也没有固定的教员，没有教学纲领，也没有训练班的组织规程，每天由宣传员约一、二人来讲演，有时讲四点钟，有时讲两点钟，担任讲演的人如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孙科、林云阶、邵元冲、谭平山等。廖、汪、胡是分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伍讲“外交问题”、孙讲“市政问题”、邵讲“德国劳动问题”、林讲“司法问题”、谭讲“国民党组织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我讲了两点钟的“中国劳动运动问题”，又讲了两点钟的“各派社会主义”。在这一个多月里，我无论有事无事，都到训练班去看看，我是抱定有事做事，无事读书的方法来对待工作与安排自己，每次讨论会我都参加，同受训人员处得很好。至于邵元冲，刘芦隐、郎醒石等都是高高在上，从来未参加讨论会，也很少到训练班。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学员们提出

请求，请中央党部重新分配工作，不愿回机关，邵元冲代理宣传部长，不接受学员的要求，也不同学员见面，很粗暴地斥责学员为无理取闹。约在七月中旬，在广东大学举行训练班的毕业考试，邵元冲、刘芦隐、郎醒石、甘乃光和我监试。邵元冲摆出一个大主考的架子，刘、郎、甘乃光跟在他前后左右，小心奉承。学员们对他们怒目而视，有的学员发问，他们不解答，学员互相交换一个意见或说一句话，他们一声吆喝，“不准说话”，我想这样一个考试为什么要这样地气象森严，邵元冲是一个前清的举人，大概这一套排场是从浙江省乡试中抄袭来的吧。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试卷都交齐了，他们把试卷带到宣传部，慎重其事关着门评了一天卷，发了榜，训练班的任务就算完了。学员们回原机关也好，不回原机关也好，有工作也好，没有工作也好，宣传部一概不管，有的受训人员来找他们谈工作，他们一概不见，也不说理由。也有受训人员去找组织部，组织部推说：训练归宣传部，用人归秘书处管，组织部无权过问。秘书处是高高在上，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基层干部问题，根本就不管。从这个训练班的问题，可以看出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态度，一个工作如果由共产党发动起来，国民党一定要拿过去，由他们去干，如果国民党人干不了办不好，宁可不办，也不能让共产党人去干，这样的作法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主张，由中间派运用。联系于顽固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原来是中间派。戴季陶是中间派的骨干，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所以他有时不能不站在进步方面对统一战线表示忠诚，否则对孙中山先生交待不过去，因此引起了张继对戴季陶的责难，在党员训练班开始筹备的时候，张继来到广州，在邹鲁家里会着戴季陶谈到共产党的问题，戴季陶无意之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张继就骂戴是共产党的走狗，戴也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

卒，彼此一句一句地争论起来，张继发了牛脾气，高声大骂道：

“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起拳头要打了，戴季陶打张继不过，当场大哭，即于次日留了一个辞呈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仍搞他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去了。宣传部由邵元冲代理部长，首先就裁撤党员训练班，我的工作也被裁了。我在宣传部工作了三个多月，从到职同邵元冲谈过一次话以后，我同邵元冲、刘芦隐、郎醒石、甘乃光等从没有说过话，见面也从不打招呼。邵元冲等对共产党专门吹毛求疵，到处找我们的麻烦，他们并把联俄、联共、工农政策曲解为联俄、容共、扶植农工。

我于1924年5月间到广州，7、8月间在广东大学师范部兼了六点钟的课，就我个人说我还不算失业，就我们的革命工作来说，我算是从工作战线上撤退下来了。正在这个期间，周恩来、陈延年两同志新从法国回来，调到广东工作，陈延年同志接谭平山的下手任广东区的书记，周恩来同志接戴季陶的下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切工作重新部署，调我到苏俄代表团资料室搞搜集资料 and 整理资料的工作，并兼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夏松云也在那里搞剪报工作，我在工作上算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资料室是鲍罗廷的助手，李洛夫任主任，资料的来源是国内外的报纸，总共有好几十份报，有中文的、有外文的、我是担任中文方面的材料搜集和整理，还有一个越南人名叫李瑞及一个岭南大学的学生廖勤生担任翻译和打字。这里的工作很忙，我们每天要从那几十份报纸上搜集整理出好几十条新闻译成俄文或英文给鲍罗廷，加仑及其他高级雇问看。有时鲍罗廷、加仑亲自到这里看报，工作很紧张，每日工作虽规定八小时，有时还要加班，我们的工资是代表团开支，很优厚。铁甲车队是直属大本营，卢振柳兼任总队长，罗加觉夫将军任顾问，廖仲恺同志

~14~